

汉魏时期家训伦理思想及其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 易 宁 吴 磊

摘要: 家训是家庭教育之精华与经典。汉魏时期是我国古代家训的奠基期,其间之伦理思想呈现出“西汉雏形、东汉成型、三国创新”之衍生轨迹。其主要论域为“修身、治家、处世、为政”等四个方面,“仁、义、礼”为汉魏家训强调修身之主要内容,治家伦理则强调了“慈、爱、孝、顺”,在处世方面,要做到“谨、慎、谦、让、诚、信”,为政则要恪守“明、贤、清、廉”的伦理准则。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为“和”。研究汉魏家训伦理思想能为当代家庭教育“教导哪些内容,用怎样的方式来教导,教导之际应注意哪些问题”等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汉魏家训; 伦理思想; 衍生轨迹; 主要论域; 核心价值追求; 家庭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7)02-0091-06

收稿日期: 2017-02-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汉魏家训家庭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应用研究”(JD16012);江西省高水平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易宁(1972-),女,江西赣州人,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吴磊,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家训是家庭教育之精华与经典,而伦理思想则为家训内容之主要内涵,通过对家庭成员伦理思想的灌输与伦理道德的养成,家庭教育便能收到“主题突出、代代相传”之成效。汉魏时期是我国古代家训之奠基期,其间之伦理思想经过“西汉雏形、东汉成型、三国创新”等阶段,形成以“修身、治家、处世、为政”为主要论域,以“和”为核心价值追求的伦理趋向,从而为汉魏以来的古代家庭教育,乃至

当代家庭教育给予了生动有益之启示。

一、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衍生轨迹

两汉三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1]。这一时期有71位作者共计创作了81篇家训。其中,西汉时期的家训主要是精要的修身为政伦理;东汉时期的家训则为男女分训,男训强调修身慎交伦理,女训强调妇德持家伦理;三国时期的家训提倡儒道互补的伦理思想,提出“静默养德”的伦理观念。

西汉时期家训数量不多,主要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给子琳书》、司马谈《命子迁》、东方朔《诫子书》、韦玄成《诫子孙》、刘向《戒子歆书》、欧阳地余《戒子》、何并《告子恢》、陈咸《诫子孙》等。这些家训虽然篇幅简短,但伦理内容却精炼扼要,涉及面也较广,其主要成分以修身伦理与为政伦理居多。比如孔臧《给子琳书》赞赏“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之德行;韦玄成《诫子孙》认为只有具备“于肃君子,既令厥德,仪服此恭,棣棣其则。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车服,荒嫚以队”的美善德行,方可为君子。又如刘邦《手敕太子》认同太子结交贤能之人的做法;刘向《戒子歆书》认为“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他告诫儿子为官应做好本职工作;欧阳地余《戒子》告诫儿子“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要求儿子在为官之任上恪守廉洁;陈咸《诫子孙》要求子孙“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陈咸反对严刑重法,主张以恩德感化民众;平当《告室家》告诫妻子:“吾居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平当认为,身居高位之际不能无功受禄,不能不劳而获,不能接受朝廷封给的侯印。这种不图名、不图利的为官之德堪称时代典范。

东汉时期家训数量陡增,其中论及伦理的多达

39篇。这一时期针对男子的家训中,有些谆谆告诫子孙交友必须谨慎,切莫滥交狐朋狗友,而应交良师益友,同时说话、做事也要谨慎,切莫对人品长论短,以免招惹口祸。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告诫侄儿们“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亦即不要乱说别人的坏话。而此间最有特色的是出现了6篇女训,这为后世女训的创作提供了优秀范本。其中,荀爽《女诫》是以四言诗的优美形式告诫女儿,出嫁后要做一位顺从的妇人,要早起晚睡,和颜悦色,勤俭持家,正身洁行;蔡邕《女诫》告诫家庭女性在梳妆打扮之际,应把心态调适好,应知晓“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之理,亦即应让心地保持“洁、和、鲜、顺、理、正、整”的良好状态。

三国时期家训数量多达34篇,在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一种“外儒内道,静默养德”的伦理特色。虽然西汉时期东方朔《诫子书》曾在随机取舍儒道思想的心态下提出“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的训诫,东汉时期郗炎《遗令书》告诫过襁褓中的儿子将来应该成为儒道兼容的“刚焉柔焉,弱焉强焉,学焉愚焉,仁焉隐焉”之才,但真正包容并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并在家训伦理中充分体现出来的则是三国时期的家训。这可谓三国时期儒道兼容的玄学思想始登大雅之堂的一种体现。比如诸葛亮《诫子训》所训诫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谓“外儒内道,静默养德”伦理思想之代表。诸葛亮要求儿子成就的是儒家之君子,即“修身养德”的儒家君子;但要成为儒家君子,内心须以“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的道家伦理为支撑,亦即必须怀有道家倡导的“静默”之心,方能踏踏实实地践行儒家的“君子之行”。

二、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主要论域

家训作品大多围绕修身齐家等主题,突出伦理教育^[2]。而在伦理教育方面,其主要论域则为“修身、治家、处世、为政”等方面。

修身是汉魏家训中首当其冲的伦理思想阵地,而“仁、义、礼”则为汉魏家训强调修身之主要内容。比如东汉时期刘廙的《戒弟伟》告诫弟弟要结交贤者,要能够“厚己辅仁”,亦即通过结交贤者而使自己更加厚实、仁德更加充实的意思,这是对交往伦理“仁”的重要性之阐发。三国时期吴国的张纡《临困授子靖留笺》曰:“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张纡要求贤明的君主以正义来割舍私恩。这种思想与荀子“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所强调的“以义制事”比较相似,他们都重视“义”在处理实际事务中的作用,以免因个人喜好或个人恩怨而坏了正事。沐并《豫作终制告云、仪等》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非圣人莫能履其从容也。是以富贵者有骄奢之过,而贫贱者讥于固陋,于是养生送死,苟窃非礼。”汉魏家训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修身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正心修志”。钟会之母《诫子行仁政》有言:“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当修所志,以辅益时化,不忝先人耳。”只有心态上端正了,才能免除祸患,进而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能够顺利修身,汉魏家训同时强调了对情欲的控制。诸葛亮《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亮认为,一个人应志存高远,去除情欲,方能成就大业。

汉魏家训的治家伦理则强调了“慈、爱、孝、顺”的贯彻。比如曹操《诸儿令》曰:“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曹衮《令世子》要求世子“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曹操所言之“慈”是“慈善”(仁慈善良)的

意思；曹衮所言之“慈”是“慈爱”（仁慈关爱）的意思，若把两者综合起来，“慈”便包含“做人要善良，对待家庭成员要仁慈，对待晚辈（或卑辈）要关爱”之内涵。班昭《女诫》曰：“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班昭强调了家庭中长辈（舅姑）对晚辈（儿媳妇）的关爱。关于孝，梁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孝子兼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这里强调了对长辈思想方面的孝。关于顺，荀爽《女诫》特别强调了妇女的顺从：“竭节从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颜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洁行，称为顺妇。”这是由于荀爽认为，妇女处于家庭伦理关系网中的关键环节，妇女顺从舅姑和丈夫，则能减少婆媳纠纷，教育好子女，让整个家庭成为慈爱孝顺之家。

在处世方面，汉魏家训强调“谨、慎、谦、让、诚、信”。其中，“谨”与“慎”是与人交往时应恪守的原则；“谦”与“让”是面对名誉、地位或钱财时应恪守的原则；“诚”与“信”是许下允诺、达成口头或书面协约时应恪守的原则。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马援希望两个侄子向龙伯高学习，因为龙伯高为人敦厚，说话周密、谨慎，没有什么可让人指责之处，且能谦约节俭、廉洁公正，有威严。班昭《女诫》曰：“谦让恭敬，先人后己。”这是将“谦”、“让”二字连用，要求妇女对待家人应谦让、恭敬，做到先人后己。王昶《家诫》曰：“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王昶认为，汉朝的东平人刘楨（字公干）博学高才，且能讲诚信，有节操。酈炎《遗令书》认为“朋友莫如信”，这是要求对待朋友一定要讲诚信；钟会母《诫子行仁政》认为“虽接鄙贱，必以言信，取与之间，分画分明”，这是要求对待所有人都得讲诚信，不管是地位低下的人，或者是坏人，都应如此。

关于如何为政，汉魏家训强调“明、贤、清、廉”的伦理准则。其中，“明”多用于对君主的素质要求，“贤”多用于对官吏的素质要求，“清”多用于对从政者的品德要求，“廉”多用于为政之际从政者面

对各种诱惑的戒律要求。若将这四条原则综合起来表述，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代朝廷，只有当君明、臣贤，官场上下都能恪守清廉之际，才能使得政治清明，国家大治。在李秉《家诫》中，李秉回想起与先帝（司马昭）的对话，不免感慨道：“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此处的“明”是“圣明”的意思。刘备《敕刘禅遗诏》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认为，执政者只有凭借高尚的贤德才能使得手下之人服从于你或信服于你。嵇康《家诫》有言：“其立身当清远。”这里的“清”是“品德清高”的意思。欧阳地余《戒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这里的“廉洁”是“因为内心廉洁，故而可得廉洁之名声”的意思。以上四条准则中，“廉”是这四个范畴中最基本的、最必须遵循的为政范畴。“廉者，民之表也”，廉洁的官吏是民众的表率。一个人可能不是很明智，不是很贤能，也够不上清白无瑕，但他必须做到最起码的“廉”；他若“廉”了，则对百姓、社会和国家有益，他若不“廉”，则将给百姓、社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在“廉”的基础之上，他可以一级一级地追求“清”、“贤”、“明”，亦即先达到“清白、清高”的要求，接着再达到“贤能、贤德”的要求，最后达到“明智、圣明”的要求。

由此可见，汉魏家训伦理思想阐发了以“仁、义、礼”来“正心修志、去除情欲”的修身伦理，以“慈、爱、孝、顺”为家庭和睦之方的治家伦理，以“谨、慎、谦、让、诚、信”为基本信条的处世伦理，以“明、贤、清、廉”为基本准则的为政伦理思想，从而使得其伦理论域宽而不泛、简而有节，为后世家训的制订树立了优秀典范。

三、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之核心价值追求

“和”这一范畴最早是由西周时期的史伯提出来的^[3]，他在回答司徒郑桓公问话时，讲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汉魏家训以构建和谐身心、和谐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和谐国家为理念，对和谐的作用以及达成各方面和谐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广泛阐述。其中三国时期蜀国向朗（约167年~247年）的《遗言戒子》是这一时

期阐发“和”的作用之代表作:

《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向朗(字巨达)援引《左传·鲁桓公十一年》所记载的“楚郢蒲骚之战”中楚国大夫斗廉所说的“师克在和,不在众”(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团结,而不在于兵力之众多),并将“和”的作用从战争论域扩展到一切论域。他认为天地相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本源,不但天地间万物的生成要靠“和”,而且人世间一切关系的维系也“非和不可”:君臣和睦相处则国家平安,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则家庭兴旺、平静安宁,圣人之道“和”的重要性,一直守护着内心之“和”,从生到死都这样。向朗从小就没了父母,但两位好心的哥哥却对这位弟弟精心抚养,教导弟弟不要因为追求功名利禄而败坏了性情和品行。所以,当向朗对儿子向条(字文豹)训诫临终遗言时,要求儿子不要以贫穷为忧虑,而应该像圣人那样,勉力守护着“内心和谐”。品味这篇家训,可以推知,“和”在汉魏时人的眼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万物生成之本源,是国家平安之保障,是家庭和谐之保证,是实现人生理想(成为圣人)之路径,是从生到死必须恪守的重要信条。不管身处何境,无论面对何种关系,“和”都是最为珍贵的法宝。

在“为政、治家、处世、修身”等方面,如何才能求得和谐呢?郗炎《遗令书》做了精炼的回答:

“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如果从“和谐”的角度来解读,那就可以解读为:在为政之际,要想求得君臣和谐,则臣子应对君主和国家忠心耿耿;在侍奉双亲之际,要想求得家庭和谐,则子女应对父母百般孝顺;在朋友交往之际,要想求得人际和谐,则应对朋友讲诚信;在修身之际,要想求得身心和谐,则应严格以礼要求自己,亦即恪守礼教之五常(仁、义、礼、智、信)。

其中,在修身层面,汉魏家训大多论及道德修养对于身心和谐的重要性(比如王昶《家诫》为追

求“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而“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以及如何修身养性(比如郗炎《遗令书》强调“消息汝躬,调和汝体”),以求得身心和谐。在家庭关系层面,一个家庭既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包括夫妻关系,还包括姑嫂、叔嫂关系等。要保持家庭和谐,做父母的首先要怀有一颗慈爱之心,做子女的则应怀有一颗孝顺之心,而作为家庭主妇,在维护家庭和谐之重任上担当起特别重要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主妇贤顺有德,则家庭和睦兴旺;主妇兰形棘心,则家庭分裂败落”。父母对子女应慈爱,王修《诫子书》就对儿子动情地说到:“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所惜也。”做父亲非常想让儿子变得很好,同时也过得很不错,除了不能把自己杀了以外,其它方面要求父亲做什么都愿意。子女应孝顺父母,但不能愚孝。王祥《训子孙遗令》对愚孝进行了列举:“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高柴是春秋时期魏国人,字子羔。他在守孝期间哀痛至极,哭泣无声,就好像泪中带血的样子。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并未赢得其师孔子的表扬,反而被孔子归为“愚孝之人”。孔子真正喜欢的孝子类型是闵子骞那样灵活地对待守孝之事。也就是说,守孝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充满哀思之情、惋惜之情、感激之情、恋恋不舍之情。在处世层面,汉魏家训特别重视“尚中守和”(比如东方朔《诫子书》所强调的“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要求交往中的人们做到敬重别人、尊重别人隐私、在酒桌上不强人所难(比如王肃《家诫》所告诫的“下坐行酒,随其多少,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并提出“谦恭、谨慎、忠信、笃敬、不毁誉他人”等为人处世之信条(比如羊祜《诫子书》所倡导的“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在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先后次序上谨记“遗己察人,舍己就人”之原则(比如姚信《诫子》倡导“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从而真正做到人际和谐上的“和而不同,和气待人”。在阐发为政之和谐价值追求时,汉魏家训既从君主的角度出发,要求君主修养道德、敬重贤者,对人仁慈(比如曹衮《令世子》倡导“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

以慈”);又从官吏的角度出发,要求官吏们公正廉洁、办事谨慎(比如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所倡导的“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还从君臣关系、臣臣关系的处理上提出了“求贤若渴、受谏不厌、公正无私”的君主待臣之方(比如张纘《临困授子靖留笺》倡导“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恭谨为节、知难而退、保身全名”的臣子对君主之策略(比如顾雍《诤责孙谭》认为“臣下以恭谨为节”)以及“尽节效力,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的处理官吏之间上下级关系之对策(比如钟会《诫子行仁政》认为“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

由此可见,汉魏家训将“和”视为其核心价值追求,提出只有“身(包括身体、地位、容貌等方面)和心(包括道德、追求、安定等方面)之间和谐了,才能安定好自己,做一个和谐的人;家庭成员之间只有各守本分,互相关爱,才能维护好家庭和睦,造就一个和谐的家庭;人和人之间(尤其是同事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应该体谅关爱,才能维持好人际关系,造就一种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在君主和臣子之间以及官吏之间,应该上下和合,互相敬重,以德相交,各司其职,才能维护国家安宁,使得朝政亨通,造就一个和谐的朝廷和国家。总之,不管是“身和心之间”,还是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之间,都应和气相待,在一团和气中互谦互让、互相关爱,亦即只有当“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价值追求时,家训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伦理教化价值,为教育子孙后代做出一番贡献。

四、汉魏家训伦理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魏家训也能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有益参考,比如当代家庭教育应“教导哪些内容,用怎样的方式来教导,教导之际应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学习借鉴汉魏家训的做法。

首先,在家庭教育的内容方面,我们不能搞单一的知识教育,也不宜搞简单的“智商加情商”教育,而应囊括“道德品质教育、家庭责任教育、处世之道教育、未来的职业道德教育”等。不过,家庭教育所涉及的内容虽多,但其主旨一定要凝练,要像

刘廙《戒弟伟》之“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那样突出中心要点。毕竟,在当代信息社会,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太多,所讲的话不能拉拉杂杂,不能占用太久的时间,以免让子女们厌烦,造成“左耳进,右耳出”的尴尬后果。

其次,在家庭教育的形式方面,不能是宣讲几条枯燥无味的守则,让子女去死读、死写、死背,而应像郑玄《戒子益恩书》那样,通过讲述亲身经历,告诫两位儿子应“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因此,当代家庭教育展开之际,也应以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子女为何要遵守这些家规,这些故事既可以是古代的名人事迹,也可以是当代人物的成功范例,但都需讲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入耳动听。只有这样,才对当代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提起子女们的兴趣,他们便愿意洗耳恭听,而有些故事因为有感人的情节,故能时不时地被子女们所记起,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

然后,在开展家庭教育之际,还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子女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施行教育。比如,孩童时代主要是礼仪教育和文明习惯养成的教育,少年时代主要是人际关系教育和理想教育,青年时代则包括男女关系教育、家庭责任教育、道德责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又如,应根据不同的性别开展教育,像班昭《女诫》之“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那样,对夫妇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进行高度概况。相应地,在当代家庭教育中,如果是教育女儿,完全可借鉴《女诫》等汉魏家训的女训思想开展教育,除了那些三从四德的糟粕应抛弃以外,一些有益的女子道德思想则应向女儿逐一灌输,使她以后不会太任性、太自私、太霸道,以免造成无法融入夫家生活之尴尬局面。另外,还应针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点评,像刘备《敕刘禅遗诏》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那样,让子女明白日常生活中的做人之道;或者是利用吃饭、睡前等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地施行教育,或者当子女犯有过错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错误之处,告诉子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以后应该怎么去改正,怎么去完善德行。

总之,学习借鉴汉魏家训伦理思想,不但有益于当代伦理道德之体系建设,而且有益于当代家庭教育,并为亿万家庭的和睦共处以及培养“立志修身,慈爱孝顺,谦让诚信,清廉贤明”的子孙后代提供优秀的学习典范与宝贵的思想启迪。

参考文献

[1]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137.

[2] 唐松波.古代名人家训评注[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9:3.

[3] 程静宇.中国传统中和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

Ethical Thoughts of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Han-Wei Period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Education

YI Ning WU Lei

Abstract: Family instruction refers to the essence and classics of family education. Han-Wei period is the founding period of ancient family i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ethical thoughts took on a growing trajectory of Western Han embryo, Eastern Han forming, and Three Kingdoms Innovation. The main concern consisted of four aspects, including self-discipline, family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life and political ethics. Major elements of self-discipline wer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and manners. Main emphasis was put on kindness, affection, filial piety, and obedience in terms of family management. The main concerns of philosophy of life were sincerity, carefulness, modesty, courtesy, honesty, and integrity.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clearness, virtuousness, pureness, and honesty should be kept concerning political ethics. Its core value pursuit is harmony. Ethical thoughts of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Han-Wei period can provide beneficial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such as what to teach, how to teach and what to concern while teaching.

Key words: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Han-Wei period; ethical thoughts; growing trajectory; main concern; core value pursuit; implication for famil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黄建新)